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赵 靖 著

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赵 靖 著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赵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张文定主编)

ISBN 7-301-03563-2

I. 中… II. 赵… III. 经济思想史-中国 IV. F092

书 名: 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

著作责任者: 赵 靖 著

责任编辑: 刘灵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63-2/F·25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875 印张 67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平装)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赵 靖 著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靖，山东省济南市人，1922年9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已出版1-4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以上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经济学志》（以上自著）等。并在《经济研究》、《孔子研究》、《国学研究》、《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科学》、《经济学家》等报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自序

本书是由作者以前在人民出版社发表过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二书合并而成的。合并后改名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

本书在基本内容、框架以及论述方式等方面,都保持原书风貌,不作大的更动。这一来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的通例;二来是我自己在仔细重读原书之后,也认为还不需作重大的修改。

当然,由于《述要》是将两《讲话》合为一书,而两者原本是独立成书的,出版的次序又是先近代后古代,在合为一书时,不作一些局部修改、调整,也是不行的。修改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改编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的上篇,并将篇名定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1—14讲改编为下篇,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先驱”。

第二,上篇26章,章名及序号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相同;下篇14章,章名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前14讲同,但序号改为27—40章,以保持全书在体例方面的统一。原书关于“讲”的名称,一律改称为“章”。

第三,原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结束语”(第15讲)取消,另写一全书的结束语,放在全书最后,与上、下篇处于并列的地位。

第四,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第一讲《中国昨天的经济思想》,为了同本书上篇相衔接,也作了改写,章名仍用。

第五,《述要》的自序是新写的。原来两《讲话》的自序,都作为

附录保留下来,以便参考。

读者也许会感到,《述要》同《讲话》的名称有相当差别:《述要》应是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之要,即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精华的论述;《讲话》则往往是指对有关学科基本知识的通俗介绍。如果两《讲话》的基本内容、框架及论述方式都尽量保持原貌,改名《述要》,能否名实相符?

此不足虑。我当初写《讲话》,当然有便于普及之意,但我自幼就不是只想把这门学科的知识性内容向读者普及,而是想把中国经济思想遗产中的精华,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尽量介绍给更多的读者。两本《讲话》,本来就可说是“讲话”其形而“述要”其实的。现在以《述要》的书名重版,决不意味着在内容和理论深度方面需作大跨度的改变。

两本《讲话》的出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颇为重要的一个事件。由我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高校教材,中华书局出版),是我进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学术园地之后的头一个重要成果,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是此书主要内容的进一步凝聚。《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写出,标志着我“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系”(《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序》)。所以,在它问世之后,由我主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巨大工程——《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随之就被土动工了。

我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写出后曾经表示:将来再版,当将两《讲话》合为一书。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恰恰在最理想时机帮我实现了十年前的这一想法。

此书即将付梓之际,距香港回归伟大祖国怀抱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只有十天了。我谨荣幸地以此书作为迎接香港回归的献礼!

赵 靖

1997年6月21日

上 篇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第一章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 毛泽东

第一节 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

从“三人谈虎”的故事说起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读书人正在读书，忽然闯进一人对他说：“闹市上出了一只猛虎。”

“闹市上哪里来的猛虎呢？”读书人一点也不信，继续专心致志地读书。

不一会，另一人跑来告诉他：“闹市上出了一只猛虎。”

读书人迟疑了一下，照常读下去。

接着又有第三人来说：“闹市上出了一只猛虎。”

读书人坐不住了，放下书本，也去找别人传播这个消息。

在评价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问题上，讲讲这个故事是不无教益的。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非常自信地说：“大概没有一个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曾经包括任何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济

分析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东西。”^①

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在内。欧洲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黑暗时代。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竟不能和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相比，这能令人置信吗？

然而，不仅西方学者，有的中国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本世纪30年代，有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教授就说过：“盖吾国古代之经济思想，与今之欧美之经济科学较，本无一顾之价值，自不待言。”^②另一位在解放前曾开设过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授甚至说：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利益”之一，就是为了使中国人“自知不足”。^③

西方学者有人这样说，中国的经济学教授中也有人这样说，连担任过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授也有人这样说，看来事情够令人沮丧了。难道中国的经济思想遗产真的就那么贫乏浅薄，不值一顾？难道中国人在经济思想领域真的就那么才识平庸，自古以来毫无成就？

既然有三个人说市上有老虎，当然应加以注意，但这并不能确实证明有老虎。要断定此事真假，只有到闹市上去亲自做一番调查了解。评价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应如此。

评价中国经济思想遗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在此以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经济思想的发展，都没有达到形成一门独立科学的水平。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近代西方相比，确实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必须承认。旧中国有一些号称“国粹

① 欧·泰勒：《东方经济思想及其应用和方法》。见《美国经济评论》1965年5月。

② 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自序”。

③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6页。

派”的人，他们把中国的封建文化看成尽美尽善，认为它优于任何外来文化。国粹派实际上是一些赞扬封建毒素的人物。在评价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历史地位时，必须反对用国粹派的眼光看问题，决不允许赞扬任何封建毒素。

但是，承认古代中国经济思想比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决不等于说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本身贫乏浅薄，无足轻重，决不等于说中国经济思想遗产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因为，一种较高级社会制度的文化形态，一般总是高于较低级社会制度的文化形态，资本主义文化总比封建主义文化更高，经济思想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后代的经济思想总是利用前代的经济思想材料发展起来的；否定了前代的经济思想，后代的经济思想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成了不可能的。而且，各时代的经济思想，是各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反映。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必须依靠和利用当时的经济思想所提供的材料。例如，在研究封建社会时，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能提供重大帮助，这种帮助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所不能代替的。

还应指出：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思想发展水平的比较，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评价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只应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同时代的西方或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经济思想相比，而不应以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思想水平要求它。以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低于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为依据而贬低、否定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把它说成是“无一顾之价值”，这不但没有历史观点，也是违背思维逻辑的。

在评价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时，“国粹派的夸人性”^①当然要反对；鄙薄中国经济思想遗产，认为它无甚价值，可以弃置不顾的民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第17页。

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历史来看,“国粹派的夸大性”并不是主要倾向,更应该着重反对的是民族虚无主义。

不是不值一顾,而是琳琅满目 一种思想、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摇篮之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文化发展更是长期高于欧洲。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和异常丰富的思想材料积累,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国封建时代所留下的经济思想文献数量之多,对有关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種经济问题探讨范围之广,都是欧洲封建时代所难以比拟的。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土地制度问题,地租和赋税、徭役问题,人口问题,封建国家的经济作用问题、封建政治及封建道德同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等等封建经济思想范围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为人们累代探讨着,争论着。经济思想材料不仅广泛存在于国家政策文件、哲学、政治著作、宗教经典以及各种文艺作品中,而且已经以专文、专书的形式,大量地直接表现出来。某些重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已初步形成了某种有系统的经济学说。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②因此,关于商品经济有关范畴的分析论述,在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封建时代有关商品、货币等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水平。例如,战国时期的著作《墨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卷,第624页。

已经指出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孟子》则认识到商品的交换比率是由商品的“情”(意为“实”,也即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所决定的,这实际上已触及价值的问题。上述成就都足以和同时代的希腊学者相媲美。公元3世纪的鲁褒写出了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专文《钱神论》,公元8世纪时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公元11世纪沈括论述了货币流通速度问题,这些更远发生在西方之前。15世纪的丘浚甚至明确地提出了“功力”即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一个蕴藏着许多文化珍品的宝库;也有力地证明:发明过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的伟大中华民族,在经济思想领域中也决不是低能的。

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早已传向世界并造福于人类;中国的琳琅满目的经济思想遗产,却因为发掘、整理得不够,至今没受到世界上甚至本国经济学界的应有注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还有无数瑰宝至今仍深埋地下。这些瑰宝一旦被发掘整理出来,就能引起世界人民的惊叹。秦始皇墓道中的兵马俑就是一例。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大力发掘、整理我们祖先遗留下的丰富经济思想遗产,使它大放光芒于全世界,是我们时代的中华儿女的光荣历史责任!

第二节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遗产不很丰富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

西方的中世纪是文化上的黑暗时代,经济思想十分贫乏;西方的古代即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则比较丰富,尤其是古希腊人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

学的理论的出发点”^①。

中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号称夏、商、西周时代的许多典籍如《禹贡》、《易》、《周礼》等,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人所作的;少数能确定为商代或西周时代的作品如《尚书》、《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所包含的经济观点也都较少,较零散。中国奴隶制时代没有留下一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文;一些散见的经济观点,在表现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方面,也缺乏明确性和典型性,甚至使人很难从它们的思想内容断定它们是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某种经济关系只有发展得比较充分了,才能通过经济思想比较明确地反映出来。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本身发展得不很充分,这就必然使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具有零散而且不够明确的弱点。

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遗产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是不很重要的。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成为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形成起来的。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 和奴隶制时代相比,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具有材料丰富、形式多样和较为完整、较为明确的特点。浩如烟海的古代经济思想材料,绝大部分存在于封建时代的书籍、文献中;各种直接的、较为集中的经济思想材料,如谈论经济问题的专文、专书和专门的经济政策文献(如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王莽的《王田禁奴诏》之类),更基本上是封建时代的东西;中国古代在经济思想方面较有水平的作品和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都出在封建时代。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经济思想材料,在反映封建的经济关系方面,达到了相当集中、相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0页。

完整和相当明确的程度。以《孟子》中关于“井田”、“恒产”的议论为例，在长不过几百字的短文中，把土地制度、剥削关系、生产经营方式、产品分配办法等一系列问题，都清晰地描绘了出来，把一幅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个体农户经济生活的图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孟轲的井田论和恒产论的出现，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反映封建经济关系的经济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为什么比较发达呢？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本身发展得比较充分，比较典型。因为：

第一，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比较纯粹，比较典型。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在奴隶社会内部经过革命和改革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不像西欧的封建制度是经过外来民族征服所促成。它未受外部暴力的干涉，完全是内部成熟了的力量作用的结果，^①因而它的形成过程比较纯粹，比较典型。

第二，在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力和文化均未遭到重大破坏。

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的时期，征服奴隶制的罗马帝国的外来民族是比较落后的日耳曼等民族，因而在征服过程中对生产力、物质财富和文化都有严重破坏，奴隶制时代的繁荣城市和工商业几乎成了一片废墟。这使西欧的封建制度不得不从一个相当低下的水平开始，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中都不如中国的

① 从历史上看，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某一地区发展得越充分，越强大，在它内部形成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就越会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而不容易获得较好的成长、发育条件，因而新生产方式代替旧生产方式的过程越是艰难、曲折而且缓慢。欧洲的奴隶制度发展得比较充分，比较典型，但它内部的封建制萌芽却成长缓慢，社会内部取代奴隶制的新社会力量不容易成熟；后来是借外部民族征服的暴力促成的。反之，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得不够充分，而奴隶制社会内部的封建制萌芽，反而较容易发育成长以致最后在内部成熟为推翻奴隶制的社会力量。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封建社会发展得不充分的欧洲先进进了资本主义，而封建主义高度发展的中国却睽乎其后。